



(美) 羅伯特·康奎斯特 主編

劉靖兆 劉振前 等譯

# 最後的帝國

— 民族問題與蘇聯的前途



-225

# 最后的帝国

——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

[美] 罗伯特·康奎斯特 主编  
刘靖北 刘振前 等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最后的帝国

1

1

(沪)新登字第201号

责任编辑 王子奇

**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

[美] 罗伯特·康奎斯特 主编

刘靖北 刘振前 等译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江苏如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 字数: 380千字

1983年7月第一版 1983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8,000本

---

ISBN7-5617-0989-7/D·050 定价: 9.10元

---

# THE LAST EMPIRE

---

Nationality and  
the Soviet Future

Edited by  
ROBERT CONQUEST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lifornia  
First printing, 1986

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出版社1986年版译出

# 中译本序

## 兼论苏联解体的民族因素

姜 琦

由刘靖北、刘振前等译的《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一书，是美国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十几位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集体编写而成的。该书以详尽的资料，从历史、经济、政治、文化、语言、宗教、民族意识、人口等不同侧面，对苏联民族问题进行了分析，视野比较开阔，开掘有一定深度，对苏联长年积下的民族矛盾的严重性，要比当事人看得透澈，书中写道：民族“裂痕继续加深，民族主义与许多更明显的问题相比也许是苏联的唯一的弱点。……随着好战的民族主义，俄罗斯和非俄罗斯的，与社会不满的其他原因——经济短缺和管理不善，生活水平恶化，信仰危机和意识形态信誉的完全丧失，特权阶层引人注目的消费和日益增长的阶级分化，或者明显的无能和腐败——结合起来并以此为动力；一种爆炸性的混合体产生了，只需一个火花，它就会燃起熊熊烈火。”1991年苏联解体的事实，说明本书作者预见的准确性。至于由于作者的政治立场，本能地流露出对共产主义的敌视态度和某些颠倒是非的分析及用语，这对我国大多数读者来说自有鉴别能力。当我们为研究一个问题，在查阅参考材料时，不必首先拘泥于是谁写的，谁说的，而应该首先看他说的是不是事实，有没有道理，然后经过自己一番思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做学问的应有态度。更何况象这样一些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写的著作，为要保持一个学者的严肃态度，一般也不

会随便粗制滥造的。为此，我作为一个读者，作为一个苏联东欧问题的研究人员，对刘靖北、刘振前等同志翻译出版了这本书深表谢意、

1991年，苏联领导人解散共产党、抛弃社会主义，使苏联发生了历史性转折，这是苏联长期来各种矛盾总爆发的结果，民族矛盾是其中的因素之一；但就联盟解体来说，民族因素的比重显然要大得多了。

## 列宁在解决民族问题中的卓识探索

苏联是一个由100多个民族组成的国家。民族问题错综复杂，它不仅有联盟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的矛盾。还有共和国之间的矛盾，共和国内部和民族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历史上就存在着。

在14世纪以前，沙皇俄国原本是单一俄罗斯民族的莫斯科公国，至15世纪末以莫斯科为中心形成统一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在以后的300年时间内，沙皇俄国不断向外扩张，凭借剑与火征服了周围100多个国家，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这100多个民族，大小不一，起源不同，大致上可以分为七大板块：俄罗斯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中亚穆斯林、高加索民族、犹太人、波罗的海民族、若干西欧和东亚民族。有些板块内又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民族。沙皇俄国辽阔的版图上居住着100多个国家，共有100多种民族语言，分属印欧、高加索、阿尔泰、乌拉尔、古亚西亚、汉藏、闪含等七大语系，20多个语族。各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民族信奉东正教；中亚穆斯林几乎全属伊斯兰教逊尼派；两个高加索民族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人则信奉基督教；犹太人有自己的犹太教。各民族有着各自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从宏观上看，这块地方正是东西方两大文明的汇集处。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差异很大。到第一次

世界大战以前，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等民族已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中亚各民族基本上处在封建社会阶段，而西伯利亚等边远地区有的尚处在原始社会阶段。

由于这100多个民族聚集成一个庞大帝国，不是自然接近和融合的结果，而是凭借武力征服所致，因此，也就谈不上具有内在涵摄力、凝聚力，倒是潜伏着巨大的离心力。历代沙皇为了维系这样一个充满离心的庞大帝国，采用的是高压同化政策。政治上建立的是中央高度集权的专制政府，向各少数民族地区派驻俄罗斯总督和官吏主持政事，凭借庞大的军队严加控制。经济上推行殖民掠夺政策，不仅摊派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而且把各少数民族地区变成俄罗斯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阻挠民族经济的发展。文化上沙皇强制推行民族同化政策，提出所谓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皇帝、一个宗教、一种语言”的口号，极力摧残少数民族的文化，禁止他们使用本国语言，强迫他们改变宗教信仰，人为地强行俄罗斯化。在民族关系上，沙皇赋予俄罗斯人以种种特权，制造民族纠纷，挑起民族对立，以便分而治之。综上所述，沙皇俄国就是列宁所说的“各民族人民的监狱。”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规律，沙皇俄国是历史上民族矛盾最深的国家之一。

列宁在如何处理民族问题上，十月革命前和十月革命后有一个认识上的转变。十月革命前，列宁原则上反对革命后建立联邦制国家，认为搞联邦制那是历史的倒退，他主张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共和国。他指出：“中央集权制的大国是从中世纪的分散状态走向将来全世界社会主义的统一的一个巨大的历史步骤。”<sup>①</sup>列宁的这一思想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民族问题有两个历史趋向，“第一个趋向就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

---

① 《列宁全集》第26卷29页。

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发生，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二个趋向就是民族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频繁，民族界限的破坏，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确立。”<sup>①</sup>第一趋向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占优势，它导向各民族集团间的分离和分立。第二个趋向导向各民族接近与联合，表明了“资本主义已经成熟，而正在向社会主义转变。”<sup>②</sup>二是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在广阔的地域内才能广泛地开展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所以，他赞成建立那种打破民族隔阂，促进经济生活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大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鉴于当时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的形势，以及恶劣的国际环境，改变了原来的主张，认为建立各民族联合的统一的联邦制国家是适宜的。这也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过程中，原来的各被压迫民族表现出独立自主的强烈愿望，并相继建立了自己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如果仍然坚持建立民主集中的共和国，则很容易造成多数民族的误解和不信任。二是国际帝国主义为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进行了武装干涉，如果不建立各民族联合的统一的联邦国家，将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只有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才能战胜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的联合进攻。列宁强调，为体现社会主义的民族平等，各苏维埃共和国应以完全平等的主权国家身份联合成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列宁甚至提出，作为大民族应该吃点亏，实行不平等，用这种态度和让步来抵偿大国民族政府在过去带给异民族的不信任。各共和国实行民族自决，有加入和退出的权利。这是列宁处理民族问题在国家体制方面的一种新的探索。这本书的一些作者把列宁缔造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看作是沙皇俄国一样的帝国，显然是十分错误的。

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建立，最深厚的基础是：①当时有统一的俄共(布)的存在，布尔什维克党在

---

① ①《列宁论民族问题》第93页。



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中起着核心作用；②有着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自愿联合的社会主义平等原则，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把各族人民联合到一起来了；③外敌的威胁是联盟的粘合剂。

当然，如何巩固联盟，还有着一系列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列宁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回答。例如，列宁把侧重点放在反对大俄罗斯主义，特别是要求俄罗斯不仅需要遵守形式上的平等，而且要作出让步，遵守大民族的不平等，以此来抵偿生活中实际形成的不平等，换取少数民族对联盟国家的支持；为了不仅使各民族在法律上享受平等，而且要达到事实上的平等，列宁提出必须加紧帮助落后的弱小民族在经济上的迅速发展，以促进民族间真正的接近。这都是富有战略眼光的卓见。但这种“让步”、“帮助”会不会给民族主义留下空隙，如何防止民族分离主义的抬头？列宁没有来得及详细论述。又如，列宁提出，联邦制是把“俄国民族最牢固地联合成统一的、民主和集中的苏维埃国家的最可靠的步骤，是向真正民主制过渡的步骤，”至于走向统一的政治经济条件是什么，联邦制在促进这种条件实现的过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对这些问题，列宁也没有来得及深入探索而过早地逝世了。如何处理好民族问题这篇重头文章，只好留待列宁的后继者来写。

## 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 在处理民族问题中的成绩及埋下的祸根

在处理复杂的民族问题中，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是有成绩的。这主要表现在：(1) 注意提高少数民族的地位，扩大少数民族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斯大林曾把各种各样的民族自治形式统一为自治共和国、自治州或民族专区，以后又把一些自治共和国提升为加盟共和国。在苏维埃政权机关实行了两院制（联盟院、民族院），使民族院成为更好地反映少数民族意愿的机构。

1936年宪法进一步增添了两院主席轮流主持联席会议的制度，规定了任何一院都具有否决权。(2)注意保障少数民族法律上的平等权利。1924、1936、1977年三个宪法文本都有各共和国有退出联盟的权利的条款。勃列日涅夫在修改宪法涉及到各加盟共和国权益时，态度严肃谨慎，他否决了要求取消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以及限制加盟共和国权限的动议。大力培养民族干部，斯大林提出了民族地区的干部“主要由当地人组成。”(3)注意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以实现事实上的平等。因为少数的民族经济、文化落后状态，是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根源；而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又是民族间产生摩擦的根源。为此，国家对少数民族落后地区实行倾斜政策，实行人、财、物多方面的支援和帮助。使中亚和南高加索地区工业迅速发展，阿塞拜疆的石油开采是占全苏的20~80%，在中亚、高加索、西伯利亚建立了纺织工业基地，在远东、哈萨克斯坦、乌拉尔等地大力发展机器制造、冶金和采矿等企业；中央还采取了“特殊的方法”，使处于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地区，加快步伐，超越资本主义阶段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方面，斯大林提出民族文化应当是“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的文化”，反对强制推行俄语，并帮助许多少数民族创造了本民族文字，出版了少数民族文字的书籍和报纸。总之，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在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方面做过大量工作，使苏联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文化方面有了显著的发展。把他们处理的民族问题说得一无是处，是不实事求是的。但长期来，他们在执行对待少数民族政策上，其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失误也是严重的，这就为后来民族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看不到这一点，也不是实事求是的。

长期来，苏联领导在民族问题上的失误主要表现在：

首先，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的建立，使苏联的结构，由形式上的联邦制演化为实质上的单一制。

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产生于20年代末和30年代中期，这种体制的形成，有恶劣的国际环境因素，有理论认识上的因素，也有阶级斗争的因素。对这种体制的历史地位、功绩和弊端，已有大量的著作和论文作了精辟分析，这里要指出的是，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建立后，所有的政治经济权力统统集中于中央政府，各加盟共和国很少有独立自主权，一切必须绝对服从中央，这样，民族自决当然也就难以兑现。这种国家结构形式上是联邦制国家，实质上已演化为单一制国家。另外，这种高度集权体制在经济运转方式上实行的是指令性计划经济，连接各共和国经济的不是商品经济关系，而是指令性计划，这就缺乏多民族国家在经济上的内聚力；加上全苏实行专业性分工，这就使一些加盟共和国的落后状况被固定了下来。文件上倡导的“使落后地区的发展赶在前面”的良好愿望当然也就很难实现。由于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中央政府又往往“劫富济贫”，搞一平二调，这又难免引起经济发达地区的民族怨言，难怪俄罗斯人说“我们总不能一直充当奶牛”。所以，这种高度集权体制的弊端，反映在民族问题上，是为民族动荡和分离主义埋下了种子。

其次，大俄罗斯主义倾向及其政策上的失误。

大凡在多数民族国家内，都有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存在。正确地解决好这两种倾向，不让其自由泛滥，是多民族国家稳定的重要因素。沙皇俄国一直是以俄罗斯民族为主导的统一集中制国家，俄罗斯主义的泛滥处于主导方面。民族主义既表现为对大俄罗斯主义的一种反抗，又是潜在的分离因素的一种表露。列宁为了建立联盟和巩固联盟，把反倾向的重点放在大俄罗斯主义一方，甚至提出了为了实行民族平等，俄罗斯民族做出让步，甘愿吃亏，实行不平等。这是有战略眼光的决策。斯大林虽然在组建联邦时提出以俄罗斯为中心建立联盟的方案，受到列宁的严厉批评，但在列宁逝世以后的一段时间，他还是遵守列宁

的教导，认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主要的危险，重点反对大俄罗斯主义。但自从十七犬(1934)以后，斯大林在反倾向重点问题上发生了态度转变，开始提出两种倾向都可能成为主要危险，继而发展为只强调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不再强调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不仅如此，他还公开宣称俄罗斯民族“是加入苏联的所有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过分地宣传俄罗斯对少数民族的“无私援助和奉献”。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这些言行，无疑助长了大俄罗斯主义的滋长，增强了少数民族的压抑感。由于大俄罗斯主义倾向，造成政策上的明显失误。在肃反运动中清洗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他们大多是对斯大林的大俄罗斯主义表示不满的人，其中包括当年反对斯大林“自治化方案”的格鲁吉亚领导人穆吉万吉等。卫国战争中因有以下几种情况，而遭到整个民族迁移：①由于少数民族中出现民族败类，而遭到整个民族的放逐；②对新占领的领土上的少数民族实行大批迁移；③对某些与邻国同族的民族，以“国家安全”为由，强行迁移。用刺刀逼迫他们离开故土，这种所谓“政治移民”，严重混淆了阶级界限，人为地造成了更深的民族隔阂。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但他已成为列宁所说的“俄罗斯化了的异族人”。斯大林以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虽然非俄罗斯民族曾经得到较温和的待遇，但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批判”，从没有放松过。总体上，他们都是沿着斯大林的路子往前走的。少数民族对大俄罗斯主义的不满情绪，正是孽生地方民族主义的深厚土壤。这种状况并没有因为宣传机器对俄罗斯民族的美德大加褒扬而有丝毫改变。事物就是这样无情地发展着。

再次，理论上的错误。

长期以来，苏联领导人在民族理论上犯了把民族进程与社会进程看作是同步的错误。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消灭了剥削阶级，建成了社会主义，因而也“消灭了产生民族纠纷的社会基础”。1961

年，赫鲁晓夫不仅宣布“苏联已经解决了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而且还上升为一种新的理论概念，认为苏联已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它有共同的社会主义组织——苏联，共同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共同的社会阶级结构，共同的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共同的目标——建立共产主义，在精神面貌上、在心理上具有许多共同特点。”1967年，勃列日涅夫宣布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民族矛盾”。提倡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在民族问题上仍然继承了前任的看法，1987年，他认为，“公正地说，我们的民族问题已经解决。”苏联已成为“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和族际主义的共同体。”这些言行都忽视了一个问题，即社会进程与民族进程是有着密切关系，剥削阶级的消灭当然会大大减少民族间的对抗，但社会进程与民族进程并不是同步的，剥削阶级的消灭不等于民族矛盾的消失，民族问题比起阶级问题来，面要广得多，内容要复杂得多，列宁早就看到这一点，他说，民族问题“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sup>①</sup>他还说，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这种错误的理论在实践上所引起的负效应是：①粉饰太平，掩盖矛盾，使苏联领导人在激烈的民族面前更加视而不见，麻木不仁；②忽视民族特点，人为地加快各民族接近的进程，这就更加激起少数民族的逆反心理，增强了离心倾向。

## 戈尔巴乔夫点了一把火，终使联盟瓦解

苏联的民族问题由来已久，一旦爆发，其势必猛，这就叫“蓄之既久，其发必烈”。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70年来，历届宪法都写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4卷，第26页。

有各加盟共和国有退出联盟的权利和自由的条文，而实际上没有一个共和国敢实践过，而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却弄得如此一发而不可收拾？苏联解体无疑是苏联内外各种矛盾总爆发的结果，而就联盟解体中的民族因素来说，我认为，主要是戈尔巴乔夫搞垮了共产党，抛弃了社会主义，经济状况又是急转直下，加上趋向缓和的国际大气候，在这样的形势下，民族主义恶性膨胀，联盟也就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在过去的70年，因为有共产党领导作为纽带，作为核心，有一个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还有一个持有批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利剑的高度集权的统治体制，在那样的条件下，所有的加盟共和国当然不想提也不敢提退出联盟的要求。

戈尔巴乔夫所倡导的“民主化”和“公开性”，这对长期缺乏民主体制的苏联人民来说确实兴奋了一阵子，苏联人讲，这好象“在莫斯科上空注入了新鲜空气。”但“民主化”和“公开性”必须与法制的建设相配套，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历史传统、人们的文化素质、人们的习惯相适应，也就是说，“民主化”和“公开性”必须有适当的度。而戈尔巴乔夫那种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民主化”、“公开性”，其结果，开始是舆论失控，出现无政府状态，继而夹杂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在进行所谓“历史反思”的旗帜之下，对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进行了“不留空白”的清算。从全盘否定斯大林开始，直至公开地批判列宁，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否定社会主义苏联建立的历史必然性，认为正是由于“十月革命诱惑了世界上1/3的人口进行了一场不成功的试验。”在人民群众思想混乱、不辨真相的情况下，这种夸大其辞带有感情色彩的歪曲评价，只能使人们的思想更加混乱，动摇了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思想理论上的混乱，又导致组织上的混乱，各种势力纷纷结帮成派。可以这样说，无边无际无度的“民主化”、“公开性”，实际上扶植了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当有人主张实行多党制、要求夺

权时，戈尔巴乔夫则步步退让，自己也认为苏共在国家政权机构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已构成推行改革的障碍机制。终于在1990年2月中央全会上通过实行多党制，同意修改宪法第6条。实行了多党制，取消了宪法赋予苏共的领导地位，这犹如打开了闸门，使苏联这样一个民族关系极为复杂、民族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家，当长期以来在人们头脑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骤然崩溃，而一时又没有什么可导致政治上忠诚的时候，民族主义思潮在民族分离分子鼓动下迅速地填补了人们意识上的空白。更为本质的原因是，千百万人的价值取向，归根到底以物质利益为转移。长期来，苏联那种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前已使苏联经济处于停滞状态。戈尔巴乔夫转了向的改革，更使苏联经济每况愈下。经济恶化和生活贫困，使人们越来越失去了忍耐。一般的规律是，当经济状况好的时候，民族矛盾还比较容易解决；当经济状况恶化的时候，民族矛盾就很难解决。各族人民对经济状况的不满，很快地通过民族主义这种极易感受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使民族矛盾更趋激化。既失去了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又抛弃了社会主义理想，加上刹不住的经济滑坡，这就使本来就有民族压抑心理的民族沙文主义沉滓，象山洪一样爆发出来，15个加盟共和国就象脱缰的马，怎么也难以驾驭，联盟解体的结局，终于成为不可避免。

苏联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正确地处理好民族问题，这将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与前途。作为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必须如实地把握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切不可动辄把民族问题简单的归结为政治问题、阶级问题。在这方面，本书作者所开掘的面，对我们是有启示的。而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共产党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实践中像列宁那样探索前进，寻求最佳的科学决策。这方面，又是本书作者所望尘莫及的。当然，最本质的问题，还在于共产党

在夺取政权后，必须千方百计地把整个国家的经济搞上去，因为经济发展状况，特别是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是关系到多民族国家统一的根本问题。如果经济上长期落后于原属同一起跑线的资本主义国家，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可言？这一点，对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来说，往往带有毁灭性的威胁。



## 译者说明

《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一书是美国最著名的研究机构之一——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组织编撰的学术著作。编撰工作由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俄国和东欧研究室主任康奎斯特主持，由当代欧美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集体完成。本书在1986年出版后，受到各国研究者的重视，成为当代欧美研究苏联民族问题的重要代表著作之一。

本书内容广泛，涵盖了苏联民族问题的各个方面。全书从内容上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总论，概述了苏联民族问题的历史与现状。第二部分分析了民族问题对苏联政治的影响，以及苏联民族政策在政治上的得失。第三部分从经济、文化、语言、宗教、民族意识、人口等不同侧面对苏联民族问题进行了分析，阐述了民族问题在这些方面对苏联未来的影响。第四部分分述了苏联各地区的民族问题，着重对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问题、苏联穆斯林地区的民族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对它们在决定苏联前途中的作用作了分析。第五部分分析了苏联民族政策和民族问题对东欧和世界的影响，并提出了西方国家对苏联民族问题应采取的对策。事实上，书中的每一部分，甚至每篇文章在内容上都不免有所交叉，具体观点也不尽一致，但全书贯穿着一个总的观点，这就是：苏联的民族问题对苏联国家制度